

掀起大生产热潮的郝家桥村

□ 吴永

年景，人年均口粮不足1.5石，是个典型的人多地少的贫困村。解放后不久，郝家桥村即建立了民主政权，在乡参议会、共产党员刘玉厚等带领下，积极响应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到1943年初便从一个贫困村变成一个相对富裕村。

郝家桥村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措施。

一是开展减租减息。由于解放相对较晚，加上郝家桥村在内的绥德全县没有开展土地革命，大量土地仍然被地主占有，农民受到地主高租息的盘剥，生活普遍贫困。解放后的第二年，郝家桥村就成立了减租减息工作队，认真开展减租减息，将原来近50%的租率减到20%—35%，减租之后出租人所得最多不得超过收获量的40%。仅此一项措施，就让农民增收20%以上。

二是改革农业生产，理顺土地租佃关系。郝家桥村每年只种一季庄稼。夏庄稼（春种夏收）产量低，最高没有超过六斗；秋庄稼（春种秋收）产量高，最高可达一石以上，几乎高出一倍。因此，夏庄稼播种比例较低，不足10%。但由此也带来了问题：因为夏粮不足，人们吃不饱饭，对秋庄稼也就疏于管理，导致秋庄稼收成减少。为此，郝家桥村对农业生产进行了改革，将夏庄稼播种面积扩大到575.5亩，提高了近17%。同时，规定土地出租户禁止对夏庄稼收租，对租佃双方都非常有利。

三是组织变工队。变工队是中国农村旧有的比较流行的一种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之上的劳动互助组织。一般是由若干户农民组成，通过人工或畜工互换的方式，集体轮流为各家耕种，按等价互利原则进行按工计酬。郝家桥村牲畜较少，只有6头耕牛和35头驴，但劳动力较为充足，组织变工队可以提高劳动效率。村里将全部农户组织起来，成立了9个小组，全村全劳动力共144人，除因兼营商业或常出外揽短工外，参加变工的全劳动力113人，超过94%。通过变工互助，郝家桥村的庄稼普遍除草4—6遍，粮食普遍增产20%左右，涌现出了刘玉厚、王德祥、郝光盛等一批“锄草英雄”。他们对庄稼的态度，就像对自己最亲近的人那样。

四是移民垦荒。郝家桥村人多地少，且无荒可开。为了解决部分地少贫民的生活困难问题，同时也为了响应陕甘宁边区关于移民垦荒的号召，积极动员23户贫民到延安垦荒。这些移民不到两年时间，平均垦荒40—50垧土地，生活上日渐富裕起来。原来生活贫困潦倒的侯生智移民延安垦荒后，短短几年就有70多垧地，两头牛，一头驴，两匹马，还雇了两个长工，日子过得比郝家桥村的富户们还好。他逢人便夸共产党好，“那样好的公家，真的使咱们过去的穷汉，一个都翻了身。”

五是把有劳动能力的妇女组织起来。“好婆姨在家纺线织布，好汉子上南路开荒生产！”热爱劳动，反对懒惰，一直是郝家桥村的优良传统。全村135名能纺纱的全劳动力妇女全部参加纺纱，而且都是中上等纺纱能手，年纺纱150斤左右。在纺纱之余，她们多数还参加打场、扬场等劳动，从事养鸡、喂羊等农副业生产活动。生产收入所得基本上和男劳力持平，一些妇女劳动能手还被评为纺纱英雄。

郝家桥村开展农业大生产的上述举措，得到了新任地委书记习仲勋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誉。1943年2月，习仲勋任绥德地委书记后，为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工作方针，亲自带领一个调查组到郝家桥村进行了为期44天的蹲点调研。习仲勋敏锐地发现郝家桥村发展农业生产的做法非常具有代表性，各行各业均走在了绥德地区大生产运动的前列，很多经验值得在大生产运动中推广。特别是当他了解了刘玉厚的事迹后，被刘玉厚为了让乡亲们过上好光景带动全村农民辛勤劳作的精神所打动。经习仲勋提议，绥德地委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刘玉厚”活动，大力推广郝家桥经验，为全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旗帜。在郝家桥村的示范带动下，绥德全县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高潮，当年除了足额缴纳救国公粮外，还解决了全区52万人口的吃饭问题。1944年，习仲勋亲自将“农村楷模”的称号颁赠郝家桥村。

郝家桥村开展农业大生产的举措。1940年2月，绥德解放后，沙滩坪区第一乡治所就设在郝家桥村。郝家桥村时有农户120余户，677人，共有土地2137垧（每垧约3.5亩），人均土地3.15垧，在正常

天一亮，你就会看见太阳微笑——李卡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宁其冲

1949年9月4日，在距离新中国成立还有不到一个月，年仅27岁的李卡在广东省韶关市曲江江旧机场壮烈牺牲了。他的遗书《天一亮，你就会看见太阳微笑》被誉为是广东版《可爱的中国》，以浪漫唯美的文字书写共产党人的初心，感动了无数人。

李卡烈士纪念碑坐落于他进行武装斗争的主要活动地——广东韶关翁源。纪念碑高约10米，共分3层。碑身使用砖体结构水泥筑就，正面铭刻着“革命烈士纪念碑”7个黑体大字，字体上方有红星照耀，下方有鲜花环绕。碑身以下又分两层，底下一层为碑座，同是砖体结构水泥材质，中间一层则是铭刻着碑文的黑体瓷砖。纪念碑庄重大气，望之肃然起敬。与一般纪念碑不同的是，碑的正面与背面都刻有碑文，正面碑文讲述了翁源革命的历史概况，尤为独特的是背面碑文，主要文字竟然是一篇遗书。背面碑文全文如下：

李卡烈士的最后遗书

朋友：

当白色的恐怖正在蔓延着，死亡之魔在狂吼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凶信，而是一个喜兆。你接到应该为此而快乐，因为任何魔力明知是消灭不了我们，而自己的心正在发慌，又故意装出残酷的面子，干尽伤天害理的事。

我走了，以后再不会见我的笔迹，也许你为此而难过。

我们这一代就是施肥的一代，用自己的血灌溉快将实现的乐园，让后代享受人类应有的一切幸福，这就是我们一代的任务，是光荣不过的事业，死就是为了这，而生者亦是生的努力方向。几多英雄勇士为此而流血，抛出自己的头颅，我不过是大海中一滴水，平原的一株草，大海既无干旱之日，烈火亦无烧尽野草之时。

我走了，太阳我带不走，你跟着它呀！永远地跟着它！

朋友，努力！天一亮，你就会看见太阳微笑。

愿你
幸福愉快

卡 留笔
旧历闰七月初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著名记者邵飘萍隐藏中共党员身份，以如刀的快笔为受压迫者发声，以深沉的思考为中国新闻学理论奠基，以抗争的精神为民族的光明探路，是无愧于那个时代的先行者。

铁肩辣手著文章。1886年10月11日，邵飘萍出生于浙江东阳一个寒儒家庭。1909年，他从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毕业后回金华任教，其间被《申报》聘为特约通讯员，为其撰写通讯。1911年，邵飘萍辞去教职，赴杭州寻找办报机遇。他拜访新闻界前辈杭辛斋，与其联手共办《汉民日报》，并发表署名“振青”的评论文章抨击社会丑恶现象，开始了职业报人生涯。1913年8月10日，他因“扰乱治安”和涉嫌参与讨伐袁世凯的罪名入狱，《汉民日报》遭封。被妻子汤修慧设法营救救出狱后，邵飘萍暂避日本，进入东京法政大学，与乡组建“东京通讯社”，为国内各报提供“东京特别通讯”。1915年底，邵飘萍学成返回上海，应邀任《申报》《时事新报》主笔。他发表了大量抨击袁世凯称帝的文章，笔锋犀利，直接影响时局。

1916年，邵飘萍出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从1916年8月23日到1918年12月11日，他共撰写了223篇“北京特别通信”，内容多为为国是。“北京特别通信”反应迅速，富有见解，开新闻报道新风气，一时风靡全国。

彼时的中国，封建军阀连年混战，国家遍体鳞伤。1918年10月5日，32岁的邵飘萍辞去第一大报特派记者之职，自筹资金创办《京报》，从此开始以笔为枪、唤醒民众的新闻救国。他亲书“铁肩辣手”挂于编辑室墙上，与报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李卡，广东化州人，一九四七年党派他到粤赣先遣支队工作。一九四九年在曲江县沙溪村被捕。在韶关芙蓉山监狱里，他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写信给亲友，痛斥国民党……一九四九年被国民党杀害于韶关机场。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

铭刻人 刘友东

碑文共400余字，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李卡在监狱最后的日子写下的遗书，后半部分简要记述了李卡革命事迹及牺牲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战士，能写出如此深情、如此无畏、如此唯美的不朽文字？

刀笔救国，以文字为武器对敌人进行无情的批判

李卡原名李钧海，1922年出生在广东化州的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就确立起投身于革命事业的大志。

手中的笔，是李卡在韶关知用中学读书时进行革命宣传的强大武器。他在《播种》中写道：“阳光用温暖的双臂拥抱大地，大地用奔流的血液滋养种子，麦粒发芽了，菜籽发芽了，希望在人们的心中发芽了。”这些文字温暖了无数在抗战时期情绪低落的人，让人们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充满希望。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卡考入广东国民大学新闻系。在校期间，李卡凭其出类拔萃的文笔在广州《建国日报》当校对和记者。他用“李卡”“徐雪”等笔名先后在《建国日报》《华商报》等报刊上发表数十篇杂文、诗歌。如他的《帽子》一诗，每一句都是以一个“子”字结束，让人读之朗朗上口，把国民党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

别人过了八年痛苦的日子
你忙了八年以上馆子坐车子
慰劳、募捐、赈灾塞满了荷包子
谁不说你个今天之骄子
广州国民党当局对李卡这些诗文又恨又怕。1946年9月起，国民党特务开始四处追捕李卡。在广州地下党组织安

以笔为枪的报人邵飘萍

□ 李 舒

社同仁共勉。邵飘萍认为，封建军阀统治祸国病民，遂在《京报》创刊号上号召“国民共起，志同道合，协力以除之”。由于讲究时效性和真实性，敢于说真话，《京报》很快成为北平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京报》坚持政府应“听命于正当民意”。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交日本。邵飘萍在《京报》上先后撰写《请看日本朝野与山东问题》《国民对待外交之准备勿以空言塞责》等评论，痛斥腐败当局的卖国行径，号召民众“一致奋起以与决一死生”。5月3日晚，北平青年学生1000多人在北大集会。邵飘萍以《京报》社长的身份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同学们救亡图存，奋起抗争。在场的爱国学生被邵飘萍的演讲深深打动，决议翌日发动各校举行学界大示威。5月4日，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爆发了。《京报》派出记者采访报道，为爱国学生助阵。此后的两个多月里，《京报》发表邵飘萍40余篇署名文章，以强大的革命舆论推动了这场伟大运动的深化发展。

秘密入党播火种。1919年8月，《京报》被官僚政客集团“安福系”查封，邵飘萍遭通缉，只得再度赴日。在日期间，他出版《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向国人介绍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研究的成果，授劳动者以必胜之券”。

1920年秋，“安福系”倒台，《京报》复刊。邵飘萍坚信“人民之觉悟不彻底，则政治之改革亦不彻底”，在《京报》发表了《导中国于国际共管之路者》《政治罪恶与社会罪恶》等文章，痛斥北洋军阀祸国殃民的行径，启迪民众反对封建军阀，体现了“社会公

排下，李卡在1946年底到了由周恩来指示在香港筹办的达德学院学习。

投笔从戎，实现从一个文人到战士的转变

李卡在香港达德学院学习大半年之后，看到解放战争如火如荼，他心焦如焚。战火燎原的内地形势让李卡无法安坐在平静的书桌前，他决意投笔从戎，投身到解放战争的洪流中去。

1947年5月间，党同意他的申请，派他去粤赣先遣支队工作。李卡一开始担任武工队支队文化教员和司令部参谋，至1948年夏，任曲南工委副书记、武工队长，实现了从一个文人到战士的转变。

在凡洞，李卡和他的战友发动群众组织了农会，建立了武工队、交通站。他们活跃在翁源、曲江边界，打击进山“清剿”的国民党军队。1948年底，敌人对凡洞进行疯狂的“围剿”，武工队粮食和弹药都非常缺乏，斗争异常艰苦。为鼓舞士气，李卡演唱革命歌曲《古怪歌》激励战友，他幽默风趣的表演使他赢得“古怪李”的绰号。李卡枪法很准，善于带兵奇袭敌人。在李卡的指挥下，武工队拔除了翁源铁场的反动据点，扩大了革命力量。敌人被袭得日夜不宁，草木皆兵，敌营中流传他会如神鬼附身一样随时随地消失不见的传说。因此，“古怪李”逐渐成为曲江家喻户晓的神秘性传奇人物。

铁血丹心，被捕入狱后用生命之笔写初心

1949年1月15日，李卡和战友在执行任务归途中不幸被捕。从被捕到9月4日被害，李卡被敌人关押了234天。自古狱中多名篇。在芙蓉山监狱不见天日的阴暗日子里，李卡用生命之笔写就了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的特质。

1924年12月5日，《京报副刊》创刊，每期16开8页。邵飘萍坚持独立自由之表达，支持主编孙伏园放开手脚办刊，《京报副刊》成为五四运动时期全国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京报副刊》的撰稿人很广泛，鲁迅曾发表了《青年必读书》《如此“讨赤”》《并非闲话》等杂文名作。1925年4月24日，邵飘萍邀请鲁迅主编随《京报》附赠的一份周刊，该刊后成为独立发行的半月刊《莽原》。

1925年，邵飘萍经李大钊等介绍秘密入党，并被赋予宣传和情报两项“特别的工作任务”。早前，他便与共产党人紧密联系，并在《京报》上长时段、大篇幅报道二七大罢工和五卅运动。他还在《京报》上编发《马克思纪念特刊》《列宁特刊》，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使马克思主义的熊熊火种得到广泛撒播。

新闻匠心培英才。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在京成立，蔡元培任会长，徐宝璜、邵飘萍为导师。这是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被称为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11月3日，邵飘萍首次授课，听课的学生包括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等进步青年。

翌年2月19日，该会改组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4月20日，在邵飘萍的指导下，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专业刊物《新闻周刊》创办，旨在“便会员之练习，便新闻学识之传播，便同志之商榷”。在10月16日举行的首届期满结业式上，毛泽东的名字出现在“得听讲半年之证书者”名单中。毛泽东回到长沙后创办《湘江评论》等报刊宣传革命思想，与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历史不无关系。



一个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信念。

他在狱中致徐云同志信写道：“（被害）在个人的幸福看来，当然是件痛哭流涕的事，在追求人类解放工作看来，是影响微小的。请你勿为我悲伤”。当死亡之魔在狂吼并来临之时，李卡却乐观写道：“让后代享受人类应有一切幸福，这就是我们一代的任务，是光荣不过的事业，死就是为了这。”当他笃定相信自己的牺牲会对后代人民的幸福有所裨益之时——死已是永生。

当敌人对他诱骗说：“我也做过共产党工作，因感共产主义不合中国，乃回国民党来。你可以像我一样，我们可以做个同事嘛。”李卡听罢以藐视口吻回敬他：“啊！原来你是——叛徒！自新？我不！要杀就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是李卡在监狱中始终如一的坚守。

当死亡之魔在李卡眼前狂吼时，他却以大无畏的乐观精神鼓励朋友们——永远跟着太阳走，他坚信我们生活的新世界，太阳是会微笑的！



以笔为枪的报人邵飘萍

1923年9月，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由京报馆出版。这部中国第一本新闻采访学专著，是他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授课讲义，后修改作为平民大学新闻系教材。他提出“报纸之第一任务，在报告读者以最新而又最有趣味、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报纸的价值主要在于“新闻材料之敏捷、丰富、真确与否”以及新闻评论是否“公平与适当”。此书与徐宝璜的《新闻学》、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被誉为中国新闻学体系诞生的三大标志。

1924年6月，他的《新闻学总论》出版，书中提出了“记者之尽职，以道德人格为基础，以侠义勇敢为先驱，而归本于责任心之坚固”等重要论断。邵飘萍的两部新闻学著作，是中国新闻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之作。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京报》立刻派记者赴现场调查采访，并刊发大量讨伐文章。邵飘萍公开斥责北洋军阀是“国民公敌”，军阀对其恨之入骨，叫嚣“宣传共产，鼓吹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以死刑”，直称邵飘萍为“卢布记者”。4月22日邵飘萍在《京报》发表“绝笔”《飘萍启事》，24日被捕，26日即被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名被枪杀于北京天桥。临刑前，邵飘萍拱手说了句“诸位免送”，随即从容就义，用生命诠释了革命报人的铮铮铁骨。

1936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邵飘萍对其帮助很大，是“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毛泽东于1949年4月亲自批复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到了晚年仍称“我是邵飘萍的学生”。1986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确认邵飘萍的中共党员党籍，此时距这位以笔为枪抵抗强权的报人以身殉报殉国已经过去整整60年。